

# 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

聂鸿音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此前学界一致认为西夏历史上存在“蕃礼汉礼之争”,这是受了《西夏书事》里几条伪史料的误导。西夏自建国以后始终如一地推行“汉化”政策,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并非发端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西夏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仿中原制度,在追求新的框架下适当保持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党项人在建国之初规定了具有自己特点的礼仪服色,目的是为民族独立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统治者就自觉地接受中原礼仪。在西夏的国民教育中,“蕃学”与“汉学”和谐共存,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蕃学”使用的教材、宣传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与“汉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区别仅在于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

**关键词:**礼仪制度;党项;西夏;北宋

**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21)04-0087-08

西夏内部的“蕃礼汉礼之争”一度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sup>①</sup>,始终被看成西夏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提倡党项文化还是提倡汉文化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不同主张与党项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sup>[1](52-55)[2](167-174)</sup>。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西夏的历史事实,其根源在于学者对古书相关记载的理解不尽合理,尤其是受到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事实上,西夏对“汉礼”的态度始终是主动接受,其治国方针追求中原文化和党项传统文化的整合,只是个别的表面形式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做过调整,而调整的总体趋向都是向中原文化逐渐靠近。

## 一、典章制度层面的“汉礼”

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深层是指典章制度,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规则,如《周礼》;浅层是指生活仪节,包括朝野的礼仪程序和衣冠制式,如《仪礼》。如果仅就前者而言,可以说西夏从未发生过“蕃礼汉礼之争”——景宗元昊(1003~1048年)正式立国时设立了典章制度的框架,相应的地方官制和军制随后经过毅宗谅祚(1047~1068年)的细化<sup>[3]</sup>,最终形成的格局贯穿西夏历史的始终,近二百年间未曾有任何人试图改变。《宋史·夏国传上》简要记述了西夏的政府

收稿日期:2021-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17ZDA264);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西夏佛经中的通假研究”(19VJX133)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男,北京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夏文学文献的汇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

引用格式:聂鸿音.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①说到党项民族的时候,汉文典籍一律称“蕃”,西夏文献一律称“番”,产生区别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当以“番”字为正,不过本文引用汉文典籍时未加改动,以求保持古书原貌。



制度。

## 二、“礼”的表面形式

相比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而言,生活中的服饰和礼仪虽然只是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表面形式,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最明显的民族乃至政权的标记,而且很容易被误解为“礼”的唯一内容。古时的改朝换代总要伴随“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形式上的变革,其意义正在于此。

西夏建立之初,元昊发布过几项政令,以区别于北宋制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衣白窄衫”“秃发令”<sup>[9](卷115)</sup>,以及“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sup>[9](卷123)</sup>等,乃至给了欧阳修以“贼中每事自用蕃礼”的印象<sup>①</sup>。事实上,元昊的初衷仅仅在于利用视而可见的文化符号,向世人宣示党项人与汉人的区别,为他的“裂土分国”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这些政令的时效就会很快降低,至多作为普通的习俗继续存在。

随着元昊仿照中原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深层的“汉礼”很快就引发了“蕃礼”表面形式的变化。在二十余年后的毅宗谅祚时期,“汉礼”在日常礼仪层面已经得到政府的接纳。《宋大诏令集》有一篇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2年)的《赐夏国主乞工匠诏》,其中引用谅祚的话说:“盖以番方素稀工巧,变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sup>[10](卷234)</sup>。《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六年十一月]己巳,夏国主谅祚言:‘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接待朝廷使人。’许之。”<sup>[9](卷195)</sup>毅宗谅祚此话的目的是向北宋王朝示好,所以可能说得有些夸张。我们不知道全体国民是否能随着一声政令改用“汉礼”,但无论如何,西夏政府毕竟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汉礼”的地位,而且准备作为一种制度沿用下去。事实上,这是西夏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从“蕃礼”到“汉礼”的明确改革,虽然只不过是外交的表面形式。

到了第三代君主惠宗秉常的时候,“汉礼”受到了太后梁氏一族的强烈反对,见《续资治通鉴长编》:

[元丰四年四月壬申,]权廊延路马军副都总管兼第一将种谔奏:“近谍报:西夏国母屡劝秉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其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之。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所激怒,欲谋杀叔母与梁相公,其言颇泄露。梁相公与叔母共谋,作燕会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于后园被害,其妻子及从者近百人皆即时继遭屠戮。”<sup>[9](卷302)</sup>

事又见俞允语:

[元丰四年六月壬戌,]近奉诏伺贼巢穴,秉常之事,臣不辍遣人深入覘伺,尚未得实,或曰秉常已为民所杀,或曰见存,不豫政事,为母所囚。以臣愚虑,秉常存亡恐不足计,虽存亦虚名耳。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汉礼以事大国,有何苛罪?而其母怒之,遂被幽囚,杀其左右,恣为淫乱。<sup>[9](卷303)</sup>

这里面说的“礼”显然是指外交仪节而非典章制度,也就是说,无论怎样争论,焦点都仅停留在“礼”的表面形式,而丝毫没有涉及“汉礼”的本质。

事实上,这是传统史书中关于王族和后族“蕃礼汉礼之争”的仅有记载,此外,我们并不能详细描述梁后摄政时期恢复“蕃礼”的实情,甚至不知道“蕃礼”是否真的施行。然而,正是这次由后族发动的政变被后世学者当成了借题发挥的本源,人们不但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蕃礼汉礼之争”的时代

<sup>①</sup>《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本国。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蕃礼,安得惟于此号独用华言而不称‘兀卒’?”

范围,而且还进一步延伸至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历来的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四段文字被清代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近代戴锡章的《西夏记》乃至当代研究者反复征引,作为西夏时代存在“蕃礼汉礼之争”的关键证据。必须指出,这四段文字恰巧全部首见于清代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而《西夏书事》并不能视为一部忠实的史料汇编。

### 三、《西夏书事》中的伪史料

据《西夏书事》卷一六说,西夏建国之初就有人反对中原式的礼义教化,而且反对者是西夏重臣、西夏文字的设计者野利仁荣,他曾经对景宗元昊上言,主旨是提倡峻法强兵,反对单纯的思想教育。

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诗书礼乐之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言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御戎夷,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sup>[11](186)</sup>

这一观点与元昊在建国前的认识相同<sup>①</sup>,只是略有文学性的扩展,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反对意见再次提出来。

《西夏书事》卷三一又说,崇宗乾顺时代有两位大臣对是否推行“汉礼”表达了对立的意见,矛盾的集中点在于是否应该重视学校教育,特别是汉学教育。肯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中丞薛元礼,他上言道: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遵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sup>②</sup>。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材,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sup>[11](359)</sup>

否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他上疏说: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持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自用兵延庆以来,典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诸州非侵即削,近边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sup>[11](371)</sup>

《西夏书事》卷三六说,时间最晚的一次争论发生在仁宗仁孝朝早期,提出意见的是当时后族的代表人物、汉族权臣任得敬,他的意见针对“养士”政策,但是没有得到仁宗的理睬。

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竿,糜廩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sup>[11](424)</sup>

此前学界认为以上四段文字表明“蕃礼汉礼之争”从西夏建国之始持续了百余年,直到仁宗皇

①《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反对其父德明“不负宋恩”的嘱托:“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②“不可以立教化”疑当作“不可以不立教化”。



史》一派藏文史籍的算法相同<sup>[20](25)</sup>。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认定,《西夏书事》里的这些叙述没有资格被视为史料。我们倾向于相信,那几份上言和奏疏完全是吴广成本人的游戏之笔,多年来学界对“蕃礼汉礼之争”的认定在极大程度上就是在这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下产生的。

#### 四、主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

如果把《西夏书事》里的这些伪史料剔除,那么就可以看出,整个西夏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蕃礼汉礼之争”。后族对帝位的挑战只是单纯的权力争夺,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持有与皇帝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

西夏没有一个君主像北魏孝文帝那样明确发布过一系列“汉化”的改革政令,但他们愿意全面接受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毅宗谅祚曾经在1062年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sup>①[4](卷485)</sup>。由此可以理解,西夏给政府规定的管理规则和在国民中提倡的思想意识大都仿照中原,法典中有些条款的设计甚至比中原还要细致。至今不好解释的只是,西夏法典中没有关于学校和科举的专门条款,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学校教育是政府最重视的文化工程。

西夏的学校教育分为“蕃学”和“汉学”,其中的“汉学”一定照搬了中原模式,而“蕃学”则是在中原模式内略微加入了党项民族的内容。现有资料表明,“蕃学”向生员灌输的知识仍然以中原文化为主,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宋史·夏国传上》说,景宗元昊在创制西夏文字之后马上命人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sup>[4](卷485)</sup>,这不应该理解为元昊在国内提倡汉文化的举措,因为那显然与他“改大汉衣冠”的初衷相悖。事实上,元昊仅仅是要寻找一些教材,目的在于尽快推广新创的文字,而党项人多年来并没有本民族的典籍可资利用,所以借用汉文书籍充当载体是不得已的决定。这个决定恰好符合其后各代君主实行“汉礼”的政策,于是整个西夏时代的主要“蕃学”教材都是译成西夏文的中原经典,最初采用的是《孝经》的玄宗注和《孟子》的赵岐章句,后来在仁宗时期改用吕惠卿的《孝经传》、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和陈禾的《孟子传》,表明政府仍然希望在西夏与中原的学校之间多少制造些区别<sup>[21]</sup>。这三种“新经学派”的著作在中原并不通行,故而可以看作西夏“蕃学”教材的一大特色。

“蕃学”教材的另一个特色可能是当代党项人的短篇作品,西夏文的《新修太学歌》里有这样几句话:“猷笭瓠, 纟纟纟纟纟纟纟, 纟纟纟纟纟纟纟; 纟纟纟纟纟纟纟, 纟纟纟纟纟纟纟”<sup>[22]</sup>(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千黑头处为德师;听作贤策贤诗词,万赤面处取法则)<sup>②</sup>。西夏的“纟”me<sup>2</sup>(贤)字也可以相当于“御”,意思是“皇帝的”。上面这几句诗似乎意味着出自皇帝之手的文学作品也被用作教材,但是这没有得到其他西夏文献的佐证,相关的资料只有一条:《宋史》卷四八六《夏国传下》说夏仁宗在即位之初“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但“训导”显然不是作诗。

西夏希望利用“汉礼”来重塑国民的思想意识。从现存的文献看,只有个别文臣向君王宣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sup>[8](133)</sup>,而在整个社会当中,为党项传统文化带来最大改变的是中原的伦理道德,主要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家庭观念。存世的西夏文著作如《圣立义海》里收录了大量中原的道德故事<sup>[23](69-83)</sup>,而《新集慈孝传》则全书都在宣传家庭和睦的必要性<sup>[24][25]</sup>。前者大约是西夏

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记载,宋仁宗答应了西夏的请求,还送去《孟子》和医书。

②西夏文学作品里的“黑头”和“赤面”连言,指西夏境内的党项人。

皇帝敕编且由政府“刻字司”刊印,后者的编著人曹道乐有“蕃大学院教授”的职衔,这说明即使是“蕃学”,宣扬的还是中原的思想意识,除了用的是两种文字以外,其教育内容与“汉学”并无本质差别。事实上,文献里从来没有反映出西夏“蕃学”和“汉学”之间有什么矛盾,《宋史·夏国传下》说夏仁宗“重大汉太学”,也并没有贬抑“蕃学”的意思,这与佛教各门派之间动辄互相攻讦完全不同。

家庭伦理道德的宣传对党项社会生活的最大影响是引发了婚俗的彻底改变。党项人有不区别辈分的“收继婚制”传统,《旧唐书·党项羌传》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中最为甚”<sup>[5](卷198)</sup>。父母也并不干预子女的婚事,《说郛·麟州府》记载党项人:

俗轻生重死,悔性亡义。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sup>[26](卷29)</sup>

至少在西夏中期,这些民间婚俗已经被“汉礼”取代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sup>[27]</sup>。在西夏后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识字课本《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不但强调婚姻须有媒人,而且还出现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成句<sup>[28](219)</sup>。对照《说郛》记载的党项风俗,可知当初的党项人对婚姻乃至生命都可以自行处置,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自然不成问题。

总而言之,西夏在立国之初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强调“蕃礼”,但涉及的不过是“礼”的表面形式,而非本质的典章制度。在立国之后不久,原来那些表面形式的“蕃礼”很快让位于“汉礼”,支持和发展汉文化成了政府的一贯主张,其间并没有发生争论。事实上,西夏境内肯定有大量的汉族人,西夏国建立后又有大批汉族人进入各级政府为官,加之政府与中原王朝有长期的外交和贸易往来,所以学习汉文化是政府在当时局势下的必然选择。

## 参考文献

- [1] 吴天墀. 西夏史稿(增订本)[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 [2] 蔡美彪,等. 中国通史:第六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彭向前. 凉祚改制考论[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4).
- [4]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5]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8[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7]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俄藏黑水城文献:7[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8] 聂鸿音. 西夏文德行集研究[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 [9]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0] 宋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1] 龚世俊,等. 西夏书事校证[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 [12]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3] 聂鸿音.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法两国的西夏研究[J]. 世界民族,2005(1).
- [14] (宋)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5]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 [16] E. И. Кычанов. Гимн свят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 [A]. 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 1968 [C].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0.

- [17] 陈庆英. 大乘玄密帝师考[J]. 佛学研究, 2000(1).
- [18] 聂鸿音. 党项人方位概念的文化内涵[J]. 宁夏社会科学, 1999(3).
- [19] 孙伯君. 西夏文献中的帝、后称号[J]. 民族研究, 2013(2).
- [20] 东嘎·洛桑赤列, 校注. 红史[M]. 陈庆英, 周润年, 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8.
- [21] 聂鸿音. 中原“儒学”在西夏[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
- [22] [日]西田龙雄. 西夏語《月月樂詩》の研究[J]. 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1986(25).
- [23] 克恰诺夫, 李范文, 罗矛昆. 圣立义海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5.
- [24] К. Б. Кепинг.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рашим[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 [25] Guillaume Jacques. Nouveau Recueil Sur l'Amour Parental et La Piété Filiale[M]. München: Lincom Europa, 2007.
- [26] (明)陶宗仪, 等, 编. 说郛三种[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 [27] 邵方. 试论西夏的婚姻制度[J]. 民族研究, 1998(4).
- [28] Luc Kwanten. The Timely Pearl, A 12th Century Tangut Chinese Glossar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责任编辑 李小凤】

##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ebate between Tangut Institution and Chinese Institution in Xixia

NIE Hong-yin

(College of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Abstract:** Previously, the academic circles agreed that there was a debate between Tangut Institution and Chinese In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which was misled by several fal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Xixia Shushi*. Since the founding of Xixia, it has consistently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 “Sinicizatio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s Family and the Empress Family did not originate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rules of Xixia government imitated the Central Kingdom system,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Tangut was properly maintained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ir country, Tangut people stipulat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of etiquette and clothing,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public opinion of national independence. O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was successful, the rulers consciously accepted the etiquette of the Central Kingdom.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Xixia, “Tangut School” and “Chinese School” coexisted harmoniously. Moreover, under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re wa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angut School” and “Chinese School” in terms of textbooks, propaganda ideology and moral concepts.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characters used were different.

**Key words:** Etiquette System; Tangut; Xixia; Northern Song Dynasty